

外出务工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袁国方¹, 邵秀军², 仪明金³

(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会计学院, 上海 201620;
2. 山西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3.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着重对流动因素(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资本因素中的外出务工收入(打工收入)对农民食品消费倾向、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以及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对食品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效应,对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收入对耐用品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贡献在所有收入变量对耐用品消费的贡献中比重最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对食品消费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外出务工收入对不同类型的农民消费倾向具有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 外出务工;消费倾向;人员流动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7X(2014)01-0069-06

The Influence of Migrant Work on Farmers' Consumption Tendency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of China

YUAN Guo-fang¹, TAI Xiu-jun², YI Ming-jin³

(1. Accounting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the flow and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on farmers' food consumption tendency, durable goods consumption, and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 tendenc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low of migrant workers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food consumption tendency, an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durable goods consumption, and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 tendency; migrant workers' incom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durable goods consumption tendency (its contribution is greater than all other variables about income). It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endency, an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food consumption tendency and social investment tendency.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flow and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consumption tendency.

Key words: migrant work; farmers' consumption tendency; population flow

近年来,打工收入已成为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外出务工在农民增收方面的贡献

表现明显。一方面,外出务工者会周期性地将自己的打工收入交给自己的家人,农民家庭收入会由此增加;另

收稿日期: 2013-05-20; 修回日期: 2013-09-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消费市场‘后而不动’的机制研究:基于脆弱性视角的分析”(09CJY071)

作者简介: 袁国方(1977-),男,河北故城人,高级经济师,博士,主要从事公司财务行为、农业经济研究,(E-mail: ygfzju@sina.com); 邵秀军(1972-),男,山西临汾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 仪明金(1977-),男,山东诸城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财务行为与农业经济研究。

一方面,外出务工者会因为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将他们所接触到的城市生活方式等信息传达给农村居民,农村家庭消费理念也因之受到影响。因此,由于收入的增加以及消费理念的变化,农民消费倾向也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目前,关于外出务工对农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消费结构变动与农民消费观念改变上。就农村消费结构而言,李恒和邵秀军均认为,外出务工对农民增收有促进作用,外出务工收入是当前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也是农民收入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同时也是增加农民其他收入的源泉^{[1][2]}。张秋惠、刘金星和王宏伟认为,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处于升级变动之中^{[3][4]}。袁国方的研究表明,农民生活正从保证温饱条件下的着重改善住房条件、购买一般生活用品和扩大较低层次的消费,逐步转向购买新型家电、家庭生产设备(如小型农用机械)和装饰住宅上^[5]。而在农民消费观念方面,仪明金、邵秀军和张喆认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仍比较保守,他们将收入、储蓄的很大部分用于住房建设、婚丧嫁娶等方面,并将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视为奢侈性消费^[6]。邵秀军、李树茁、李聪等认为,农民在应对风险时采取的是谨慎性的消费策略,而部分进城打工族由于受到城镇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或接受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方式,他们的消费思想倾向于向城镇居民靠拢^[7]。王宏伟认为,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正在从“无风险预期”向“风险预期”转变,从攀附式和集中式消费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消费转变^[4]。

尽管外出务工会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倾向产生重要影响,但多数有关外出务工影响农民消费倾向的研究缺乏对外出务工人员流出地经济发展差异程度的关注。外出务工对农民消费倾向的影响显然会因流出地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外出务工在增收目的性上并不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外出务工那样强烈和唯一,在消费方式与观念方面也不如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城镇间的差异那样明显^[8]。显然,关注欠发达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及其收入对农民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具现实意义。此外,尽管以往研究指出了外出务工对农民消费观念及消费结构存在的影响,但研究缺乏系统性,特别是缺乏对不同类型农民消费倾向的具体分析。本文主要关注我国欠发达地区外出务工对农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并且对不同类型的农民消费倾向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计量模型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研究方法。问卷在参考当前常用的农户生计问卷基础上设计改造而成^[9]。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对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石泉县、岚皋县三县的农户生计的 1106 份问卷调查,其中各县受调查人口分别为 500 人、267 人、339 人,分别占调查总人口数的 45.2%、21.4%、33.3%。相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言,这三个县均属于欠发达地区,通过外出务工脱贫致富是当地经济的一大特点,符合本文在地域选择上的研究要求。

2. 计量模型

本文将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倾向公式设定为:

$$y_i = \alpha_1 x_1 + \alpha_2 x_2 + \alpha_3 x_3 + \alpha_4 x_4 + \alpha_5 x_5 + \varepsilon \quad i=1, 2, 3, 4 \quad (1)$$

其中, y_i 表示因变量, x_1 表示流动因素, x_2 表示资本因素, x_3 表示观念因素, x_4 表示风险因素, x_5 表示社区因素, α 是待估参数, ε 是残差项。

食品消费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必须支出, y_1 表示食品消费投资,通过问卷询问“家中上一个月的食品消费(米、面、菜等)的数额”得到。耐用品消费投资为农民家庭富裕程度的表现之一(即生活水平的表现之一), y_2 表示耐用品消费投资,通过问卷询问“家中上一个月的电费的数额”得到。人力资本投资在农村主要为子女教育与劳动技能的学习的支出,是农民提高自身或家庭劳动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 y_3 表示人力资本投资,通过问卷询问“当年子女上学支出和生产技能培训的金额”相加得到。社会交往投资作为农村社会现代化交际的表现形式之一, y_4 表示社会交往投资,通过问卷询问“家中上一个月的话费和今年人情往来的礼金费的数额”相加得到。

x_1 表示流动因素,表示农民家庭中有外出务工人员(调查问卷显示,有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占总调查人口的 74.4%),由外出务工收入大于零得到。

x_2 表示资本因素,根据 DFID(英国国际发展署)对资本的划分标准,将资本因素划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资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五类。自然资本以其所拥有土地面积表示,通过问卷询问“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得到;金融资本包括农业收入、养殖收入等,农业收入通过问卷询问“家庭 2010 年的水稻总产量、油菜总产量、小麦总产量、玉米总产量(以公斤为单位,

分别乘以水稻、油菜、小麦、玉米本年的平均价格的总和)得到, 养殖收入、打工收入、补贴、其他收入均通过问卷得到, 其中补贴收入包括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补助、移民补助、其他补助, 而是否有存款、是否负债也均通过问卷提问得到; 物质资本包括房屋间数以及其他物资性资产。房屋间数是通过问卷询问得到, 本文在问卷调查中设计了 15 项物资资产选项(如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家庭耐用消费品等)调查样本农户是否有这些资产, 通过计算样本农户所拥有的资产选项占有所有选项的比值, 获得一个介于 0 与 1 之间的数值测量变量; 人力资本包括户主年龄、家庭人口等因素。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数通过问卷的形式得到, 非劳动力人口数为老人数、学生数和儿童数的总和。户主受教育程度通过问卷的形式得到并设置“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4 个自变量。户主是否为党员是通过询问“户主的政治面貌”得到; 社会资本包括家中是否有干部及其社会网络规模。家中是否有干部是通过问卷询问得到(家里有人担任乡、村干部的占 15.8%)。社会网络规模通过提问“家里急需大笔开支时(比如盖房子、做买卖)可以找到几户家庭借钱”来测量, 测量值作为社会网络规模的数值。

x_3 表示观念因素, 购物时是否在意价格, 通过询问“购物前我会比较几家商店里同类商品的价格”测量。

x_4 表示风险因素, 分别为意外事件造成损失和预计最大支出两个自变量。通过询问“本年度家中是否有意外事件发生”得到。预计最大支出是通过询问“您认为您家可能发生的最大的支出”得到, 并设置“盖房、结婚、子女上学”等自变量。考虑到耐用品消费在农民的消费观念中属于奢侈性消费, 在日常性消费(食品消费、子女学费等)保持一定水平的条件下, 风险因素对耐用品消费有明显的影响, 本文在对耐用品消费倾向分析模型中加入了风险因素。

x_5 表示社区因素, 通过问卷提问农户所在地距离城镇的距离(km)直接得到。

二、结果分析

1. 食品消费、人力资本和社会交往投资倾向分析

本文利用 Stata10.0 软件对(1)式的计量模型进行了 OLS 回归,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考虑到外出务工流动因素与外出务工收入因素之间的线性关系, 这两个变量不同时出现在模型中)。为了研究外出务工对食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和社会交往

投资倾向的影响, 本文进行了以下模型分析: 模型 1 为各种收入变量对食品消费支出的回归分析; 模型 2 为流动因素、资本因素(除去是否有存款、是否有负债等变量)、观念因素与社区因素对食品消费支出的回归分析; 模型 3 为除去流动因素后其他变量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回归分析; 模型 4 为流动因素及土地面积、养殖收入等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回归分析; 模型 5 为资本因素与社会交往投资的回归分析; 模型 6 为流动因素与养殖收入、是否有存款等自变量对社会交往投资的回归分析。

从表 1 中 6 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 基于模型 1 与模型 2 可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 对比模型 1 中外出务工收入变量系数和模型 2 中流动因素的系数, 外出务工收入变量的系数为正, 而流动因素的系数为负。外出务工会引起家庭劳动力(即家庭人口)的流动, 使得家庭常住人口相应地减少, 其结果是属于日常性消费的食品消费相应减少。考虑到收入与支出的正比关系, 外出务工收入应对食品消费有正的贡献。因此, 流动因素对食品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效应, 而外出务工收入对食品消费有贡献。从模型 1 可看出, 外出务工收入变量的系数在各类收入变量中较小且不显著。考虑到外出务工的周期性, 务工人员定期将收入带回家中, 这种形式决定了外出务工收入不可能长期对日常消费有贡献。因此, 外出务工收入对食品消费没有显著贡献。

其次, 由模型 1 可以看出, 补贴收入对食品消费的贡献有显著的正效应, 并且在各类收入变量中贡献较大。补贴属于转移性收入, 农村领取补贴的为较贫穷家庭, 模型中补贴收入作为日常生活维持的支出, 说明政府补贴对较贫穷的农村家庭日常生活的维持是有效果的。由模型 2 可以看出, 观念因素中的关注广告对食品消费倾向的影响是显著的。电视等多媒体设备在农村的普及以及由外出务工引起的对农民生活习惯的影响, 使得农村居民在接触广告机会增多的情况下, 也更容易接受到广告中显示较好生活水平的暗示, 这会使农民的食品消费观念不再局限于温饱, 而是趋向于改善、提高生活质量。

第二, 基于模型 3 与模型 4 可得到以下结论:

模型 3、模型 4 中流动因素与打工收入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均有负效应, 这意味着外出务工人员替代了原来接受教育的人员。因此可以推断,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多数为刚走出校园的青年, 青年人的精力

旺盛、学习能力强,容易从事收入较高的且含有较强技术性的工作(如修车、理发等),这表明外出务工由过去的“纯体力打工”转向“技术类打工”。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流动因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有一大部分是为了提供家中子女或弟妹的教育资金,这使得外出务工对人力资本投资有一定的正效应,这两种相对效应的抵消使得流动因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可以发现,模型

3 中打工收入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且存在较大的负贡献。模型 3 中外出务工收入的系数远小于零,这表明外出务工人员对原来接受教育者的替代是较多的,在实际生活中,农村接受教育者普遍为支出较少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而接受高等教育者为少数。多数农村青年选择外出务工(包括技工类)的赚钱方式以独立生活。总之,外出务工对人力资本投资倾向有显著的负效应。

表 1 食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和社会交往投资倾向回归分析

	食品消费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		社会交际投资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外出务工		-83.100*		-1028.160		-71.832
农业收入(Log)	15.910	22.061	-1753.908		94.992	
养殖收入(Log)	30.652	12.126	2950.453**	829.950**	508.464	667.011***
打工收入(Log)	7.831		-2662.273*		821.215	
补贴(Log)	45.285***	11.541	637.322		312.995	
其他收入(Log)	21.782	25.917*	-513.499		287.932	
存款	-13.428		4569.480*	2534.050***	-409.367	347.390
负债	27.171		3317.618	2193.269**	959.964	906.824**
物质资本						
房屋间数(间)		10.805	277.694		-101.518	
物质资本指数		-10.070	-15560.200**	-3767.984	195.025	
户主年龄(岁)			140.237		2.322	
户主是党员		34.082	-3458.763	649.309	339.704	1537.080***
户主受教育程度 (以文盲为参照)						
小学			3316.222	552.449	-33.340	
初中			3266.967	45.098	335.235	
高中及以上			2576.903	902.371	-588.717	
家庭人口数			1534.408*	841.936***	401.846	262.892
老人和儿童数		20.129				
家中有干部			2775.361		-392.677	1084.373**
社会网络规模			297.132		-177.681	
购物时在意价格		37.853				
留意广告		77.945*				
到城镇距离(km)		0.717	67.328	13.952		-47.192***
所属县(以旬阳为参照)						
石泉		120.644*	-831.923	-1317.981		-2150.000***
岚皋		86.900	792.543	-494.682		-405.732*
常数项	-420.850	-242.573	6125.171	-4036.973	-13117.200	-1982.299
R ²	0.104	0.101	0.207	0.059	0.151	0.133

注:***、**、* 分别表示结果在 1%、5%、10% 的水平下显著。

第三,基于模型 5 与模型 6 可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由模型 5 可得出结论:打工收入对社会交往投资倾向不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农民的社会交往活动由客观社会关系环境决定,社会交际是日常生活中一

种相互往来的交流方式,并不会因为个人外出务工导致收入增加或受城市生活习惯影响而明显增加。只有通过扩大实际社会交际的圈子才会使得社会交往投资增加。由此推断,外出务工并没有实际扩大农民的社交

圈。现实情况是,外出工人员在城市中一直处于自己原来的交流圈中(农村的交际圈),并没有有效地融入当地居民的社交圈中,甚至对于新认识的工友都保持谨慎态度(分开以后不再保持联系)。这种情况说明外出务工人员交际中缺乏自信、交际能力较低。因此,外出务工收入对社会交往投资倾向没有显著影响。

其次,由模型 6 可得出结论:流动因素对社会交往投资倾向不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农民的主要社交圈在农村,而流动因素对社会交往投资倾向没有显著效应,这表明人员的流动对农民在家乡的社交活动的影响并不明显,一方面电话等通讯方式使异地沟通更为方便,外出务工人员没有脱离与家乡人员的交流;另一方面,农村普遍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亲戚、朋友式的社交活动可由家人代其参加。因此,流动因素对社会交往投资倾向没有显著影响。

2. 耐用品消费倾向分析

本文利用 Stata10.0 软件对(1)式的计量模型进行了 OLS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耐用品消费倾向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外出务工		-1206.800	437.555
农业收入(Log)	-3963.400		
养殖收入(Log)	570.646		
打工收入(Log)	9902**		
补贴(Log)	851.896		
其他收入(Log)	284.512		
存款	-13644*	-3064.400	-2777.800
负债	9606.120	6077***	4876**
房屋间数(间)	1677.380	2161***	2145***
物质资本	9745.760	4213.920	3701.180
户主是党员	-1749.900	-1248.100	-1407.600
家庭人口数(人)	-3672.100	0.672	32.174
家中是否有干部 (是=1)	-10873	-2484.200	-2330.800
社会网络规模(户)	432.699	227.032	224.363
有意外事件造成损失	-11534		
预计最大支出 (以盖房为参照)			
子女教育	-7724.300	-7352.200	-6330**
看病	-6028.300	-5222.900	-4310.500
其他	-1934.400	-2805.200	-2862.500
到城镇距离(km)	-120.560		62.911
所属县 (以旬阳为参照)			
石泉	3898.520		7555**
岚皋	-7212.000		1565.840
常数项	-47457.200	-3237.700	-8110.500
R ²	0.236	0.090	0.100

注:***、**、* 分别表示结果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为了研究外出务工对耐用品消费倾向的影响,本文进行了以下模型分析:模型 1 为收入变量以及各非收入变量对耐用品消费支出的回归分析,模型 2 为流动因素以及除去收入变量和社区因素的其他变量与耐用品消费支出的回归分析,模型 3 为流动因素及除去收入变量的其他因素与耐用品消费支出的回归分析。

从表 2 中 3 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由模型 1 可以看出外出务工收入对耐用品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贡献,且占耐用品消费的比重是所有收入变量中最大的。由此推断,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集中在对家庭硬件设施的改善上。从消费倾向的角度来说,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倾向有显著的正效应。在消费结构方面,农民是在基本温饱需求有保证的前提下,将务工收入作为耐用品支出的主要经济来源,即农民消费支出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与计划性。由模型 2、模型 3 中流动因素的系数先为负数而在加入社会因素的模型 3 中改变为正数可知,外出务工作为农村家庭较高的收入来源,流动因素本应对耐用品消费有正效应。因此,若将农村耐用品分为务农性耐用品和生活性耐用品,而社区因素可以体现所属县的农业水平,可知在模型 3 中社区因素分担了务工收入对务农耐用品消费的贡献,使得务工收入对耐用品支出的贡献偏向于生活耐用品。而就现实情况而言,由外出务工引起的劳动力流失对于农业收入来说存在负效应,所以模型 3 中流动因素的系数由负数变为正数。因此可得出结论:外出务工对生活耐用品消费是有正效应的,但同时阻碍了农村农业收入的增加。同时必须说明的是,模型 2 与模型 3 中流动因素所起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农村经济中收入结构不稳定造成的。

其次,模型 2、模型 3 预计最大支出中的子女教育(以盖房为参照)有显著的负效应。这表明农民将教育支出摆在耐用品支出的前面。农民对待教育态度已经由“可有可无”转变为“必须有”,同时在风险预期中将子女教育作为未来较大的重要支出,这是农民对教育重视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同时由模型 2、模型 3 可以看出,金融资本中的负债对耐用品消费倾向有显著的正效应。在实际生活中欠发达地区农民对于借债的支出倾向于对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非金融性投资。同时应注意到农民传统观念中“无债一身轻”或“不到不得已而不借钱”已经改变,导致借钱行为的底线也已经降低。究其缘由,一是农民收入的增加,使得其对于

偿还所负债务有一定信心,而这也离不开外出务工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显著效应;二是由于外出务工农民受城市消费习惯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借债作为日常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最后,模型 2、模型 3 的物质资本中房间数在耐用品消费中有显著的正效应。一般来讲,房间数与耐用品消费有正比例关系。考虑到农村的居住条件,模型 2、3 中显著的正效应表明了农村居住条件的提高,对比盖房并配备相应电器设备的情况来说,空盖房而不住人的情况减少了,这正是农民收入增加的表现,而外出务工恰恰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促进作用。

三、结 论

本文根据陕西省安康市三县 1106 户农民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外出务工对农民食品消费倾向、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以及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研究发现:

首先,外出务工流动因素对欠发达地区农民部分类型的消费倾向存在直接影响。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对食品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效应,对耐用品消费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倾向有负效应但并不显著,对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也不显著。可见,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导致的家中常住人口的减少仅对食品消费等日常性消费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对其他类型的消费倾向并没有明显的直接影响。

其次,外出务工收入对欠发达地区农民部分类型的消费倾向存在直接影响。外出务工收入对食品消费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对耐用品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贡献在所有收入变量对耐用品消费的贡献中比重最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对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外出务工收入对耐用品消费倾向的正面影响最为直接,同时也能减弱人力资本投资倾向。

以上研究结论初步表明,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

外出务工收入对不同类型的农民消费倾向具有不同的影响。然而,由于研究设计不完善及研究条件的限制,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及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民的某些消费倾向没有发现直接影响,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研究设计中农民消费倾向细分程度不足,导致不同效应之间发生相互抵消的情况,例如,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对务农型耐用品和生活型耐用品的效应的相互抵消;另一方面,忽略了对外出务工与农民消费倾向间可能存在的中间变量的考察,无论是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还是外出务工人员收入,都可能通过影响生活观念、负债观念等变量进而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倾向存在某些间接影响。后续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分和完善欠发达地区的各类农民消费倾向,同时加强对外出务工和其他影响因素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倾向的协同机制分析。

参考文献:

- [1] 李恒. 外出务工、消费导向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J].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07, 22(5): 21-24.
- [2] 邵秀军. 农户外出务工行为对养猪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8, (12): 35-41.
- [3] 张秋惠, 刘金星.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4): 48-54.
- [4] 王宏伟.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趋势及制约农民消费行为的基本因素分析[J]. 管理世界, 2000, (4): 163-174.
- [5] 袁国方. 农村耐用品消费市场的潜力研究[J]. 开发研究, 2012, (2): 95-98.
- [6] 仪明金, 邵秀军, 张喆. 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研究——基于 1978~2010 年的消费趋势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2, (4): 68-72.
- [7] 邵秀军, 李树苗, 李聪, 等. 中国农户谨慎性消费策略的形成机制[J]. 管理世界, 2009, (7): 85-92.
- [8] 张红伟, 吴瑾.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2(1): 19-24.
- [9] 凡军义. 务工培训政策对农户消费意愿的影响[J]. 中国外资, 2011, (6): 214-215.